

# 金融学期刊的评价:文献简述\*

王军 高岩

**[摘要]**本文简要探讨了金融学学术期刊的评价问题,对决定期刊质量和影响力的因素进行了阐释,并通过国外金融学学术期刊研究文献的归纳和解读,以及国外一流期刊的介绍,初步剖析了我国金融学期刊存在的不足之处,给出改善期刊质量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金融学期刊 影响因子 引用

**JEL分类号:**A11 A12 G00

## 一、导言

随着学术研究作为一种职业的兴起,学术评价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因为,学术评价不仅事关学者职业发展和学术声誉,而且还牵扯到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等诸多环节,故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由于学术评价本身涉及诸多因素,既有主观因素,又受客观限制,因此,学术评价极有可能成为一种充满争议的智力冒险,对于将人类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而言更是如此。不过,正是由于学术评价本身的重要性和挑战性才吸引了无数学者的持续关注。

即使仅关注金融学这一迅猛发展的经济学领域,我们也会发现国外围绕金融学期刊展开的研究其实已经相当丰富和细致。这些不断增加的文献为我们了解国外金融学期刊的发展历程提供了有益的参照,而研究和借鉴国外一流金融学期刊的成功经验无论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还是对于中国金融学期刊而言,都是颇有价值的一项课题。

本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准备的,我们希望探究决定和影响学术期刊这样的知识产品价值的因素,阐述评价和衡量学术期刊的指标体系和方法。考虑到中国金融学学术期刊的发展现状以及我国学术界对学术期刊问题的研究现状,我们希望在评述国外学者的观点时,能够提炼出一些对提升我国学术期刊质量有益的启示。

本文剩余部分是这样安排的:第二部分简述了期刊评价和学术影响力的观点;第三部分,在对国外相关研究文献归纳和解读的基础上,对金融学领域期刊评价的主要文献进行了简要评论;最后的结束语概括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对我国期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诊断,提出改善和提升我国期刊质量的几点建议,强调期刊的规范化运作特别是同行审稿制对于提升期刊质量的重要作用。

## 二、学术期刊的评价与学术影响力

从本质上讲,学术期刊是一种知识产品。因此,对学术期刊的评价也就是对知识产品的评价。知识产品显然拥有其他普通商品所不具有的特质,这不仅体现在衡量知识产品的价值找不到也不能用衡量普通物品价值的一般尺度如价格,甚至也不能用销售量如杂志的发行量等来衡量学术期刊的影响力。毕竟,凝结人类智慧的知识产品并不是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不可能用普通的财务指标来衡量它的生产成本。知识产品更多是学者充满个性的创造成果,理解这一点是有非常重要的,因

---

\* 王军,南京审计学院经济系,副教授,经济学博士;高岩,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教授。

为我们只有从知识产品的本质属性出发,才能理解和把握学术期刊的评价思维和具体方法,否则我们对于衡量知识产品的价值是无法达成共识的<sup>①</sup>。

评价不同期刊并进行排序是个复杂的过程,关键在于能否建立一个相对完备的参照系以此衡量不同的期刊。由于统计数据的侧重点不同,因此需要繁琐且细致的统计调整以便不同指标可以比较。与此同时,学术期刊的评价还涉及到影响力这一问题<sup>②</sup>,而影响力也是一个极易引发争议的概念。这一点对于衡量研究型学者的影响力同样是适用的,如果一位学者的研究被更多地引用,那么,这位学者就拥有了更大的学术影响力。学术影响力不仅需要足够的被引频次,还必须通过时间来检验。

长久以来,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对于期刊评价问题已做过相当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且不断有新文献涌现。例如,2011年2月,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为纪念发行100周年,专门邀请包括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经济学家选出过去百年该杂志发表的最有价值的20篇文章。要从《美国经济评论》过去100年发表的所有文章中选出最有价值的20篇文章绝非易事<sup>③</sup>,这本身就是一项充满着挑战和创造性的工作。正如Arrow等(2011)开宗明义地强调的,文章的质量和意义是遴选的重要尺度,这其中,数字图书馆(JSTOR)提供的引用数字非常重要。Arrow等还提到,著名经济学家未必能够生产出经过时间考验的作品。例如,名噪一时的经济学家 Irving Fisher 虽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过多篇论文,但现在看来,这些文章的价值都不大,甚至“转瞬即逝”(ephemeral)。这个例证告诉我们学术影响力需要时间来考验。

从上述国际学术期刊的最新动向中我们不难获得如下启示,即国际一流学术期刊非常关注自身的演化进程,并会及时总结和归纳这些历史经验。正如我们即将展开的评述,无论是经济学领域,还是金融学领域,国外学术界围绕学术论文、学术期刊以及研究机构等相关问题的评价已积累了大量文献。我们也注意到,国内学术界对期刊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文献计量学领域<sup>④</sup>,从经济学角度探讨期刊问题的文献并不多见,而专以金融学期刊评价为探讨对象的研究文献更是寥若晨星。为此,本文主要关注国外金融学领域的文献,我们希望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即国外学者对于期刊问题的研究已十分丰富,也希望通过国外文献的解读和评价了解学者对于金融学期刊的一般观点,尤其是围绕期刊评价的重要结论和思想观点展开相关论述,以此刻画金融学期刊的某些典型特征。

### 三、期刊评价:来自国外金融学研究者的观点

对于学术期刊的评价历来是国外经济学家和金融学者关注的问题,而且,相当多的文献是运用现有的技术手段和方法,比如运用文献计量学中的流行方法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期刊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学术期刊进行排名。正是由于学术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因此,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学术界会对这个问题保持持续性的关注,如不断发布学术期刊的排名信息,这部分解释了这一领域文献日益增长的原因。但对学术期刊的评价方法却相对稳定,因为判断学术期刊质量及影响力的评价方法是基础性的和一般的,它们已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学和金融学等领域的学术评价之中<sup>⑤</sup>。

囿于篇幅,这里主要关注与金融学期刊评价相关的英文文献。这些文献涉及金融学期刊的评价与排名,各期刊排名的变化情况,以及一些细节问题,如期刊影响力与文章影响力的区别以及金

<sup>①</sup> 本文的“期刊”指学术期刊,他们与现实中存在的大量非学术期刊存在明显的不同。

<sup>②</sup> 在本文中,我们认为论文(期刊)的质量与论文(期刊)的影响力是一致的,它们都主要由被引频次来决定。

<sup>③</sup> 值得一提的是,20篇文章中有许多属于金融类文献,如佛里德曼1968年的《货币政策的地位》一文就位列其中。

<sup>④</sup> 如邱均平等(2011)从文献计量学角度提供了一个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

<sup>⑤</sup> 参见 Moed(2005)及邱均平等(2011)对学术评价方法的一般说明和运用。

融学期刊的作者特征等等。考虑到这些文献往往并非仅涉及一个问题,而是多个问题相互交织,再加上稍后的文献往往会有引用之前的文献,因此,为评述方便,下面的讨论主要是以这些文献出现的先后秩序而展开的。

早期,Klemkosky and Tuttle(1977)以三种金融学期刊<sup>①</sup>为统计对象,归纳了在金融研究领域中发表文章最多的研究机构,并对这些机构的集中度进行了分析。Schweser(1977)进一步研究了1964~1975年期间《金融学杂志》(*Journal of Finance*)论文作者的博士授予单位,发现该杂志文章作者中有46.2%的人在美国接受过教育,他们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集中在10所精英大学,有高达72.3%的作者毕业于20所一流的商学院。Heck等(1986)在《金融学杂志》发行40周年之际,也总结和归纳了1946~1985年期间该杂志文章的作者和机构情况,并依据作者、取得博士学位的机构以及文章发表时作者的工作单位等三项指标出现的频次进行排序,试图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Niemi(1987)同样研究了1975~1986年期间各研究机构在一流金融学期刊的表现。可以说,这些文献大都集中在对一流金融学期刊统计特征的描述上,结论多彼此印证,相互支持。

遵循上述研究传统,Borokhovich等(1995)深入探讨了661家学术研究机构于1989~1993年期间在金融研究领域的生产力和影响力问题,通过对16种主要期刊这五年间发表论文的分析,发现其中40家机构贡献了50%以上的论文数量,6家机构占据了2/3数量的论文。至于学术影响力,则更加偏离正态分布了,如这些期刊发表论文所带来的全部引用中有50%由20家研究机构提供。其中,论文发表的数量和影响力与研究机构的规模和学术声誉密不可分,著名商学院往往具有较高的发文量和较强的影响力。总之,对于一流金融学期刊而言,无论是作者以及作者工作单位,还是作者博士学位授予单位都呈现出越来越集中的特点和趋势<sup>②</sup>。

最近,Borokhovich et al.(2011)以一本具体刊物《银行和金融杂志》(*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为例,构建了一种期刊评价体系,其核心思想是建立在引用基础之上的。作者进而将这种方法运用于该杂志的评价之中,指出该杂志已经成为金融领域的重要期刊之一,且影响力仍在继续上升。由于该杂志刊发了大量银行领域的文章,因此它已成为银行研究领域中非常有影响力的刊物。

还有一些学者以更加宽泛的视野,热衷于对不同期刊进行对比,并设法用影响因子来衡量不同期刊的质量和重要程度。Alexander and Mabry(1994)细数了金融研究领域的四本期刊<sup>③</sup>,分析了这些期刊对于金融研究活动的相对贡献率,并依照这些期刊所刊发论文的引用情况对其进行排序。通过对每年发表在这些刊物论文平均数量和论文平均字数的权重调整,作者列出了50篇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以及50位被引频次最多的作者。Borokhovich等(2000)则对发表在主要金融期刊论文的引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借助“社会科学引用指数”<sup>④</sup>给出的影响因子,对决定期刊影响力的因素进行了剖析,他们发现这些刊物的影响因子实际上还受到金融领域之外引用的影响,如经济学等相关研究领域的引用就很重要,而与金融学各分支学科发表论文的分布情况关系不大,并认为影响因子并不是衡量论文长期被引频次的好指标。

在国际经济学界曾经流行着“要么发表文章,要么面临毁灭”的说法(Skeels and Fairbanks,1968;

<sup>①</sup> 这三种期刊是《金融与定量分析杂志》(*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金融学杂志》(*Journal of Finance*)以及《金融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他们曾被并列为金融领域三大期刊。本文中,凡英文期刊首次出现即给出期刊的中英文刊名,之后再出现时仅提中文名。

<sup>②</sup> Hodgson and Rothman(1999)发现,国际一流经济学期刊的作者和编辑已呈现出一种“机构寡头”情形。通过分析全球排名前30位的经济学期刊,他们发现70.8%的期刊编辑来自于美国,12所美国大学占据了其中的38.9%,作者中65.7%来自于美国的研究机构,12所美国大学占其中21.8%。正如他们指出的,这些数据令人不安,因为编辑和作者在机构和地理两个维度的过度集中可能会损害经济学研究的创新。

<sup>③</sup> 这四本期刊为《金融学杂志》、《金融经济学杂志》、《金融与定量分析杂志》以及《金融研究评论》(*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sup>④</sup> “社会科学引用指数”(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即SSCI,是Thomson Reuters下属的科学信息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ISI”)每年就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期刊引用情况发布的一份报告,因其全面和准确的统计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Boyes et al., 1984), Zivney and Bertin(1992)也以金融研究为例验证了这一观点,他们考察了严苛的学术竞争是否有助于提升作者的学术生产力问题,此处的生产力是以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的。通过对金融学博士 25 年间发表论文的综合分析,两位研究者发现,如果能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一年发表一篇论文,那么这无疑是令人惊叹的。实际上,仅有 5% 的金融毕业生能实现这一目标。考虑到一流研究机构终身职位的提供往往重在审核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依据这些信息预测作者未来发表文章的潜力,Zivney 和 Bertin 提出的方法对于各研究机构人事部门的招聘工作无疑是最有帮助的。毕竟,各研究机构都希望招聘到最具有研究潜力的合适新人,而这就需要制订出经得起推敲的学术评价方法。

另外,Arnold 等人(2003)则从影响力角度剖析了究竟什么因素在影响金融学研究这一问题,如哪些刊物发表的哪些文章对金融研究施加着较大的影响,以及哪些杂志实际主导着上个世纪最后 10 年的金融学研究。在全面分析了金融学、计量经济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权威刊物后,结论是《金融学杂志》和《金融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毫无争议地成为这一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期刊,其他杂志如《金融研究评论》(*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商业杂志》(*Journal of Business*)以及《金融与定量分析杂志》(*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对金融研究的影响也很大,而非金融类期刊如《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以及《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对金融研究同样施加着重要影响。他们还列出 1990~1999 年期间主要金融学期刊引用最多的前 50 篇论文,发现前 10 篇被广泛引用的文章中有多达 6 篇是由非金融类期刊,如计量经济学和经济学杂志刊发的。尽管《金融学杂志》的引用最多,但仅贡献了上述 10 篇中的 1 篇,《金融经济学杂志》平均每篇文章的影响力最大,且上述 10 篇最有价值文章中有 3 篇由该杂志首发。Arnold 等最后指出,通过分析顶级金融学期刊发表的被引频次最多的文章,我们不仅能评估期刊的质量,而且还能找到不同期刊发表的最具影响力文章。这既可帮助研究者选择合适的期刊发表论文,也为研究者确定有用的文章提供了线索,教师也可据此选择更恰当的材料纳入到课程教学之中去。

按照学术界的标准,一篇论文的价值可细分为两部分:一是文章的内在价值,由文章作者的努力决定;二是,刊发文章的期刊也会对文章的价值施加影响。前者类似于决定文章质量的内生变量,而后者可视为影响文章质量的外生变量。Krishnan and Bricker(2004)提出一种测算方法,探究在稿件内在价值一定的情形下,期刊对稿件的价值能有多大贡献。他们认为,论文的内在价值可由作者的声誉和所在研究机构的声誉决定,而期刊对论文价值的提升取决于编辑工作的质量、创刊历史以及期刊读者群的反馈。他们还将这种方法运用于 1990~2002 年期间五种金融期刊<sup>①</sup>所刊发的文章,得到一些有趣结论。通过 Tobit 回归分析,Krishnan 和 Bricker 发现三种期刊即《金融学杂志》、《金融经济学杂志》以及《金融研究评论》能够有效提升论文的学术价值,有时增加的价值甚至可超过了文章本身的内在价值。

类似地,Smith (2004) 质疑顶级期刊发表的文章是否名符其实这一问题。依据 SSCI 公布的 1996 年发表论文的平均引用频次,Smith 对 15 种主要金融学期刊进行了排队。为与顶级期刊发表的平庸文章相区别,他提出了一个“顶级文章”(top article)的概念,并指出期刊经常犯的两类错误:一类是,顶级文章被顶级期刊拒绝,于是顶级文章不得不发表在排名靠后的一般刊物;另一类为,非顶级甚至是平庸的文章被顶级刊物接受,遂戴上“顶级文章”的光环。Smith 认为,由于这两类错误非常普遍,故读者寻找顶级文章的努力必须是在同类期刊全方位检索。读者应该更多地关注文章的内在质量,而不是仅仅以其载体即期刊来妄断文章的质量。

值得关注的是,Currie and Pandher(2011)建立起一种依据金融学研究者学术活跃程度来评价

<sup>①</sup> 这五种期刊是《金融学杂志》、《金融经济学杂志》、《金融与定量分析杂志》、《金融研究评论》以及《商业杂志》。

学术期刊的方法。他们利用互联网调查和反馈获得的数据,再根据期刊的质量和重要程度对 83 种金融学期刊进行了排队和分类,如把期刊分为 A、B、C 和 D 四组,每一组又分为上中下三级。通过对来自 37 个国家、反馈率为 45% 的调查数据的嵌套式回归(nested regression)分析,作者认为这种建立在“活跃学者评价”(Active Scholar Assessment)的方法能够帮助作者了解自己在本学科研究领域的排位,加快相关机构对研究人员职称评定与晋升的工作评估,同时帮助大学图书馆更好地购置和管理期刊资料,而针对本领域学术研究活跃学者的分析对于各期刊编辑部强化或提升本期刊的地位同样富有意义。

国外金融学者对本领域期刊研究和发现,就方法而言,大都采用了数量分析手段,这一点与现代金融学研究弥漫着的定量化特点是吻合的。值得一提的是,国外许多一流金融学期刊经常会刊发一些探讨本领域期刊发展与期刊质量问题的研究论文。这表明,即使是这些最优秀的期刊也十分注重自身的质量管理,同时,也说明国外学术界已形成关注和研究期刊发展较为成熟的学术氛围。这种氛围的一个核心构件便是竞争,不同学术期刊的竞争,不仅带来了学术的繁荣,而且期刊自身的质量也得到了提升。

#### 四、启示与结论

以上我们对国外金融学期刊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从思想源流上看,我们认为国外学术界以被引频次作为衡量期刊质量和学术影响力的理念同样适用于中国学术期刊的评价,期刊质量和影响力应该主要由所发文章的被引频次来决定和衡量。结合国外一流期刊的办刊经验,我们认为借鉴国外同行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完善的审稿制度和规范化的操作不仅能够提高我国金融学期刊的发文质量,而且还可改善期刊的质量。毕竟,对于学术期刊而言,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如在参考文献和注释等方面推行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做法<sup>①</sup>。不过,此等规范化做法要取得成效,还离不开我国学术期刊的整体行动。因为欲使期刊的被引情况被观察和统计到,仅靠少数期刊的努力是不大可能实现的。如果说引用类似于经济学中的技术外溢现象,那么,各期刊的规范化努力则多少具有了公共物品的属性,于是,为确保此类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就必须依靠全体期刊的共同努力。在这种场合,各期刊的自律是重要的,而来自相关管理部门的积极干预也是必要的,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有效矫正一些期刊的学术失范行为。

通过与国外金融学期刊的对比,我们认为借鉴国外学术期刊的成熟做法,尊重学术活动的内在规律是提高我国金融学期刊质量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而以专家为主匿名评议等规范化制度的引入对于改善文章和提升期刊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相信随着统计方法的创新以及统计软件的出现,期刊评价会出现更多的新方法,特别是互联网时代新型信息搜寻工具的出现会使得数据的采集更加广泛,分类和处理也更为准确和及时,这或许能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新的机会。

众所周知,我国现有的体制性因素已严重阻碍了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一些影响、束缚甚至决定期刊发展的基本关系尚未得到厘清。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对期刊尤其是刊号实施严格的管制,但却未建立起相应的期刊淘汰机制。这种情况不仅使得我国不少希望举办学术期刊的研究机构面临着创立发行等进入方面的困难<sup>②</sup>,而且还必然导致我国学术期刊出现总量规模

<sup>①</sup> 在现代学术活动中,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的规范体现在许多细小但却重要的方面,如一篇学术论文应该有“内容摘要”、“关键词”、“文献综述”、“注释”以及“参考文献”等等。其中,后三者不仅仅具有写作规范的涵义,也是学术道德规范所要求的。对于建立在被引频次基础上的期刊评价而言,学术论文“参考文献”部分的完善与否将直接决定被引频次这一指标的准确与否。

<sup>②</sup> 国外学术期刊的创立和发行已相当成熟。Laband and Piette(1994)曾统计,1976~1985 年有至少 55 种新的经济学期刊出版发行。隶属美国耶鲁大学的“金融评论协会”(Society for Financial Studies)不仅创立了《金融研究评论》,这一目前公认的一流期刊,而且 2011 年还创立了另外两份新的刊物,即《资产定价研究评论》(Review of Asset Pricing Studies)和《公司金融研究评论》(Review of Corporate Finance Studies),请访问:<http://www.sfs.org/>。

虽不小但布局、结构依然不够合理的局面,学术期刊“大而全”和“散而小”的特征也使得我国学术期刊整体影响力不高,缺乏国际竞争力。西方发达国家对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也实施着分类管制,但多数情形是放开对学术期刊的进入,于是,那些有实力、以学术研究为己任的研究机构则自然会分流为学术期刊的主办者。尽管一些商业机构也会举办学术期刊,但却难以与前者进行竞争<sup>①</sup>。来自国外的实践也表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机构是不大可能办好学术期刊的。二是,国外期刊的收费模式主要是吸引并刊发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再由出版集团出版,建立大型数据库,然后将这些数据库打包卖给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大家熟知的 Sciencedirect 和 Springer 都是这种模式。国外一些学术期刊也会收取“版面费”,但这些费用大都在可承受的范围,毕竟这些期刊的维系并不依赖“版面费”。相比之下,国内一些学术期刊的收费模式是存在问题的,这部分是由于国内几大数据库支付给编辑部的著作权使用费非常之低,以至于一些期刊不得不靠收取“版面费”生存,而办刊经费投入的不足也催生了这种情况。由此可见,我国部分期刊的办刊模式是不利于学术期刊的发展的,学术期刊不应该被当作盈利的工具。我们注意到,近年我国学术期刊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sup>②</sup>,但总体而言,我国尚未形成真正有助于学术生长的社会环境。

除去上述因期刊管制带来的问题之外,国内现有由行政力量推动的各类期刊评价体系也问题多多,因为多数评价机构仅仅关注那些数量方面的僵硬指标,热衷于对各学科的期刊进行排名,而对数据的深度分析不够重视,在挖掘期刊质量潜力方面更是乏善可陈。此种既非建立在市场竞争基础上的学术评价体系,也非国际公认由影响因子衡量期刊质量的评价体系不仅误导社会,发出错误信息,导致学术资源的不当配置,而且还阻碍了真正的学术创新,甚至为设租寻租等学术腐败行为披上了合法外衣。

显然,上述种种违背学术精神的僵化管理模式是不利于打造真正优秀的学术期刊的,更无法培育起具有独立开拓精神的学术氛围。因此,未来我国学术期刊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借鉴国外优秀期刊的成功经验,尤其应大胆尝试那些经过国外同行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例如,如果学术期刊的刊号和进入能够放松管制,同时调整对于研究者绩效考核的导向,那么,我国期刊市场将有望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上来,学术界的不正之风和学术腐败也会逐步缓解。这也是我国学术期刊突破发展“瓶颈”,保持继续上升势头,适应社会各界对高质量期刊需求的必然选择。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金融学期刊的整体质量已有了明显提升,在许多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我国金融学期刊整体与国外优秀期刊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尤其与那些国际一流的金融学期刊相比,我国金融学期刊可谓任重而道远。由于学术期刊的成长离不开整个社会的学术氛围,更离不开整个社会环境和政府的扶植,因此,打造优秀的学术期刊不仅是我国期刊界责无旁贷的使命,也是社会各界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重大问题。考虑到学术期刊是一国学术生态的晴雨表,因此,由我国学术期刊反映出的种种不利于学术发展的“综合症”需要政府尤其是期刊主管部门逐一理顺和解决,而借鉴国外学术期刊的成熟做法乃至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制度体系应该是我国学术期刊和有关管理部门的当务之急和明智之举。

## 参考文献

邱均平,燕今伟,刘霞(2011):《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RCCSE 权威期刊、核心期刊排行榜与指南(2011-2012)》,科学出版社。

Alexander, J. and R. Mabry (1994): “Relative Significance of Journals, Authors, and Articles Cited in Financial Research”, *Journal of Finance*, 49, 697-712.

<sup>①</sup> Bergstrom(2001)研究了商业机构举办的学术期刊,通过对被引频次和期刊定价的换算,列出了 36 本性价比奇低的“流氓期刊”(Rogue’s Gallery)。

<sup>②</sup> “迹象”体现在近年我国出现了《金融评论》和英文的《中国金融评论》(*China Finance Review International*)等新的金融类学术期刊。这些高起点的学术期刊对于繁荣我国金融学研究进而提升我国金融学期刊质量的作用,都令我们感到鼓舞并充满期待。

- Arnold, T., A. Butler, T. Crack and A. Altintig (2003): “Impact: What Influences Finance Research?”, *Journal of Business*, 76, 343–361.
- Arrow, K., B. Bernheim, M. Feldstein, D. McFadden, J. Poterba and R. Solow (2011): “100 Years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The Top 20 Articl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 1–8.
- Bergstrom, T. (2001): “Free Labor for Costly Journal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5, 183–198.
- Borde, S., J. Cheney and J. Madura (1999): “A Note on Perceptions of Finance Journal Quality”, *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 12, 89–96.
- Borokhovich, K., R. Bricker, K. Brunarski and B. Simkins (1995): “Finance Research Productivity and Influence”, *Journal of Finance*, 50, 1691–1717.
- Borokhovich, K., R. Bricker, K. Brunarski and B. Simkins (2000): “An Analysis of Finance Journal Impact Factors”, *Journal of Finance*, 55, 1457–1469.
- Borokhovich, K., A. Lee and B. Simkins (2011): “A Framework for Journal Assessment: The Case of the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35, 1–6.
- Boyes, W. , S. Happel and T. Hogan (1984): “Publish or Perish: Fact or Fi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Education*, 15, 136–141.
- Chung, K. and R. Cox (1990): “Pattern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Finance Literature: A Study of Bibliometric Distributions”, *Journal of Finance*, 45, 301–309.
- Coupé, T., V. Ginsburgh and A. Noury (2010): “Are Leading Papers of Better Quality?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 62, 1–11.
- Currie, R. and G. Pandher (2011): “Finance Journal Rankings and Tiers: An Active Scholar Assessment Methodology”,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35, 7–20.
- Ellison, G. (2002): “The Slowdown of the Economics Publishing Proces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0, 947–993.
- Ellison, G. (2011): “Is Peer Review in Decline?” *Economic Inquiry*, 49, 635–657.
- Freedman, D. (2010): *Statistical Models and Causal Inference: A Dialogue with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ck, J., P. Cooley and C. Hubbard (1986): “Contributing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to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46–1985”, *Journal of Finance*, 41, 1129–1140.
- Hodgson, G. and H. Rothman (1999): “The Editors and Authors of Economics Journals: A Case of Institutional Oligopoly?”, *Economic Journal*, 109, 165–186.
- Klemkosky, R. and D. Tuttle (1997): “The Institutional Source and Concentration of Financial Research”, *Journal of Finance*, 32, 901–907.
- Kodrzycki, Y. and P. Yu (2006): “New Approaches to Ranking Economics Journals”,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5, Article 24.
- Krishnan, C. and R. Bricker (2004): “Top Finance Journals: Do They Add Value”,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8, 361–378.
- Laband, D. and M. Piette (1994): “The Relative Impacts of Economics Journals: 1970–1990”,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2, 640–666.
- McCabe, M. and C. Snyder (2005): “Open–Access and Academic Journal 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95, 453–458.
- Moed, H. (2005): *Citation Analysis in Research Evaluation*, Springer.
- Niemi, A. (1987): “Institutional Contributions to the Leading Finance Journals, 1975 through 1986: A Note”, *Journal of Finance*, 42, 1389–1397.
- Palacios–Huerta, I. and O. Volij (2004): “The Measurement of Intellectual Influence”, *Econometrica*, 72, 963–977.
- Schweser, C. (1977): “The Doctoral Origins of Contributors to the Journal of Finance from 1964 through 1975”, *Journal of Finance*, 32, 908–910.
- Skeels, J. and R. Fairbanks (1968): “Publish or Perish: An Analysis of the Mobility of Publishing and Nonpublishing Economist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35, 17–25.
- Smith, S. (2004): “Is an Article in a Top Journal a Top Article?”, *Financial Management*, 33, 133–149.
- Zivney, T. and W. Bertin (1992): “Publish or Perish: What the Competition is Really Doing”, *Journal of Finance*, 47, 295–329.

(责任编辑:程炼)